

关于糖堆儿,天津有许多故事。我小时候是一个糖堆儿铁粉,每天都可能吃上几串糖堆儿,有爷爷、奶奶的奖赏;今天的“大仿”(书法),老师画了大红圈儿,奖励一串糖堆儿;今天有客人来,不许淘气,努力表现,客人走后,自然是有糖堆儿一串;小猫将我吃饭的不碗打落地上摔碎了,挨个新的不行,我还要那样的,放声哭个不停,正好院外传来一声“糖堆儿咧”,哥哥出去买一串,带回来一串,我破涕为笑,碗碎的事一笔勾销;晚上去姑奶奶家,我就是不去,好夕哄着,看见路边卖糖堆儿的,又是一串糖堆儿。

诸君不妨算算,这一天已经几串糖堆儿了?最是良机,随母亲去看戏,小媳妇的戏,母亲全神贯注,正是捣乱换糖堆儿的时候,于是,又是一串糖堆儿。回家后不肯好好刷牙,30岁就满口都是假牙了。

丁伯玉糖堆儿

家住南城,小伙伴们结伴去北大关。下午4点,丁伯玉糖堆儿准时上街,就在丁伯玉糖堆儿固定的卖点,等着买丁伯玉糖堆儿的人早围上了,那时候,不兴排队,丁伯玉到场之后,“您先来”“您先来”,相互敬让,仅一会儿工夫,丁先生就举着卖糖堆儿的“靶子”回家了。

丁伯玉的糖堆儿何以如此热销?此中必有道理,更有外人不能掌握的秘。小孩子就知道又甜又脆还不粘牙,别人的糖堆儿比不上。据说,这位丁伯玉先生原是富二代,自幼养尊处优,最可悲,身无一技之长。后来家境败落,走投无路,想起自幼在家练得一手蘸糖堆儿好手艺,于是放下身段以制卖糖堆儿谋生。

到此时,丁小爷终于明白了馅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硬道理。只是,丁家原是大户人家,你放下身段沿街叫卖,有损家族名声呀。据说,有一天,丁府的老辈人找到北大关来,找到了丁伯玉卖糖堆儿的地方,老人一句话不说,令随从掏出了一把钞票,厉声向丁伯玉大哥喝道:这糖堆儿我全买了!说着,随从就要夺拿糖堆儿。此时,丁小爷张开双臂拦住此人,对他的老本家说道:我的糖堆儿只卖一人一串,不能卖一个“主儿”。接着,丁小爷放声大喊:糖堆儿呀,丁伯玉的糖堆儿呀!你越怕人们知道这个卖糖堆儿的人姓丁,我越是吆喝上众人一片喝彩,彰显了天津爷们儿自立的好品德。

在北方,乡下的女人一年四季极少能真正闲下来。农忙时扑在田里,耕种着一亩三分地;农闲时守在家里,炕上地下,都是把好事。

母亲就是那个忙碌的乡下女人,季节在变,母亲的忙碌不变。

深秋一过,天气转凉,粮食进仓了,田野里荒芜了。母亲带着收获的喜悦和作为一个农民满满的成就感,正式回归了家庭。

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母亲的忙碌在炕上。北方的农村,冬天的那种冷是彻骨的冷,家家户户的土炕上,被褥统一在炕脚处码成高高的被垛。夜里睡觉,稍稍富裕点的家庭,每人总要盖两三层棉被。

母亲的忙碌就是从翻新土炕上的那些被褥开始的。先是奶奶的,再是父亲的,我们的,最后才轮到母亲自己的。每一条被子,经历了春、夏、秋三季,棉絮早已不再蓬松,被面和被里也已经不再洁净。母亲每拆开一条被子,都会将被面和被里洗净,晾晒在院子里。滴水成冰的季节,被面和被里很快便冻得邦邦硬,在冬日吝啬的阳光下,凝成一块巨大的画板,上面雕满了鲤鱼跳龙门、龙凤呈祥、牡丹富贵的亮丽图景。母亲坐在土炕上,把旧棉絮慢慢扯开,用事先弹好的新棉花,一点点融入旧棉絮中,重新加工整理。母亲有时坐着,有时躺着,有时还要猫腰……整理棉絮的过程,母亲不急不躁,偶尔会望向窗外。风刮起一片干枯的树叶,穿过被面和被里中间的空隙,一直飘向了远方。那一刻,母亲便有些愣神儿,直到叶子远离了自己的视线,母亲才又重新做起了手中的活计。

经过两三天的晾晒,被面和被里总算干透

直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一位不知姓名的糖堆儿艺术家,还在经营他的特殊生意,如今80岁往上的老人,也许有人见到过这位糖堆儿艺术家的“作品”,至少他的后代应该还在天津。如果能找到这位糖堆儿艺术家的后人,应该恢复这门“艺术”,并且评为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位天津糖堆儿艺术家,不制卖一般的糖堆儿,他制卖的是特殊糖堆儿,属于贵重礼品。他有自己的生意经,每逢年节,他更是拜访天津大户人家,征订礼品。天津老户人家,送官礼是一宗大事,这类礼品不是金钱,更不是名酒、名烟。那时候的名酒,就是正宗的女儿红、状元红、花雕、加饭等等。我家收到过一罐多少年的老酒,开封后香飘全院,后院的人们急急跑过来,询问前院出了什么事?我看到了,用一根筷子伸进酒里,能挑起一线酒来。据说,这种酒三盅能醉倒人,让你昏睡三天三夜。

再说这位糖堆儿艺术家的作品,这年几月份,是家里老人的八十大寿,他记住了,到时候,一件“寿比南山”的糖堆儿艺术品准送到家来;这年什么时候,大少爷娶媳妇,到了日子,几件作品同时送来,一件是送给新人的“天作良缘”,一件是认亲大礼“喜结连理”;那一年,我本人也有大事,母亲问要什么礼品?我张口要了一件大礼“孙悟空”,天天想、日日盼,礼品终于送来了,真的是一个孙悟空,蟠桃会上偷吃桃子的孙悟空——只是不会眨眼睛。

缝起来的故乡

刘士帅

了,没了水分,自然变得柔软。母亲用她那双经年劳动,早已经不不太柔软的手,把柔软的被面、被里、棉絮贴在一起,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母亲做针线活是村里有名的巧手,针线在母亲手里,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它们在被子上游走,带着特有的节奏感,不出三五分钟,一趟引线已经完成了从起点到终点的旅程。一床床旧棉被,在母亲手中幻化成一幅幅新作品,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视野,继而又来到我们的身上。夜里,松软的棉絮,带着些微的馨香,抵挡了冬日的严寒,也明媚了沉沉的梦乡。

家人的棉被翻新过了,母亲并没着急翻新自己盖的那床棉被。她在等待,等待远方的一个包裹。那个远方,在北京的大兴,那里是母亲的故乡。每年秋后,地里的花生成熟了,晾晒好了,姥姥都会叮嘱老姨给母亲寄花生。姥姥家那片肥沃的土地,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花生,老姨寄过来的花生个儿大、皮儿薄,果实饱满,入口微甜。收到包裹的母亲,脸上现出孩子般的惊喜,抚摸着来自家乡的包裹,母亲的眼睛竟有些湿润了。“一晃,八年没回家了。”母亲微微叹了口气,小声明咕着。

1966年12月18日,父亲不幸因公去世,年仅41岁。噩耗传来,31岁的母亲痛不欲生。当时,父亲所在单位给出两个补偿办法:一是“大把握”,即一次性支付抚恤金后,我家从此与父亲单位脱离关系,再无瓜葛;二是每月领取父亲工资的一半,直到我们姐弟三人参加工作。

在北京的老叔和两个姑姑,都赶到天津帮着处理我父亲的后事,面对这两个补偿方案,现场气氛凝重,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母亲,等待她做出最终的抉择。

当年,我姐姐十一岁、我九岁、弟弟四岁,如果一次性“大把握”,大致可以拿到两万多块钱。考虑到我奶奶尚健在,大致需要分成三份,母亲和我们一份,奶奶一份,叔叔可能也多少能拿一点。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关键时刻,母亲尽管无比悲伤,但脑子却异常清醒,她擦了一把眼泪,声音虽小,但口气坚定地否定了“大把握”方案,果断地决定每月领取我父亲工资的一半,即每月42元。再加上母亲已在“人委”工作,才使我们不至于陷入饥荒的窘境。

随着我们姐弟三人陆续参加工作,母亲领取父亲工资的金额,也在逐年递减,直至停止。其实,母亲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还向所在单位提出了一个额外要求,即让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父亲前妻的儿子)接父亲的班。哥哥当年17岁,在农村老家跟着奶奶务农。如果能够接父亲的班,就可直接实现“农转非”,彻底改变他人生命运。正是此举,使我哥哥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当上一名工人,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对于当年母亲做出的关乎他一生命运的决定,哥哥一直感怀于心,念念不忘,以各种形式回报我的母亲,并将母亲视为他的亲生母亲。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妈啊,您办了一件我亲妈都没办到的事,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您的恩情!”每每想起这些,我们都由衷地为母亲感到自豪!

父亲与母亲的姻缘是由我父亲的战友刘胜做媒(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刘伯伯)。1954年,刘伯伯转业到石家庄工作,一次在火车上邂逅我母亲。通过攀谈,得知母亲刚从驻扎在北塘的公安83团311四支队(即现在的武警部队)复员,准

一直觉得,鸟儿是一种神奇的、带有神性的物种,在这个世界上,数不清有多少种,有多少只鸟,它们可能和树叶一样多。有时候,在窗前看着那些鸟儿们,就心生羡慕,那鸟儿或成群,或单只,由着性子飞翔,迎着清风鸣叫。喧闹的时候,不觉得纷杂,安静的时候,不觉得清寂,长天上鸟儿们不觉得高,茂草中它们也不觉得矮,鸟的飞翔不是为了争高夺远,仅仅为了生存,所以看着那些鸟儿们就心生羡慕,觉得自己浅薄。

一直让我内心愧疚的是,小时候没有少“祸害”鸟儿们,那时候一到晚上,便和小伙伴打着手电筒到树林子里去,那些鸟栖息在树枝上,我们用手电筒照着它们,它们一动不动,于是从兜里掏出来泥球,那是用胶泥(一种很有黏性的泥土)搓成的小圆球,晒干了如同石子一般坚硬,把那些“子弹”装进弹弓用来打鸟。在我家的屋顶,有五根裸露的金属电线,应该是邮电的通信线路,上边经常整整齐齐地站着一些鸟,很漂亮,像五线谱,小时经常用弹弓射它们。那时我们还把一根小棍子,拴上一根细绳,顶起一个筛子,里边放一把米,然后躲在旁边,把鸟引到筛子里面再把绳子一拉,鸟就被扣在了里面了。我一直纳闷,捉到的那些麻雀为什么养不活,有时掏了一个鸟窝,捉到几只小麻雀,挺精心地喂它虫子,喂它米,但总是养不活。大人们说,麻雀气性大,你捉住了它,它就会抑郁而死。现在想起来,麻雀是一种有气节的动物,性格和德行甚至胜过人。

年龄越来越大,就越想到自己儿时对鸟儿那些难以启齿的经历,于是更觉得一定要善待它们。家里经常放着几袋米,大米、小米容易长虫,原来会会长了虫子的米,装进袋子扔到垃圾箱,虽然觉得可惜,但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后来在阳台上坐着,发现楼下的鸟飞来飞去,便想,不如把这些长了虫子的米给了它们。以后每天早晨,就抓一把虫米洒在草坪的甬道上。这时候麻雀就先来了,麻雀的警惕性是很高的,起初它们看着地上突然出现的食

姥姥家的花生,成了我们姐弟可口的零食,更是母亲翻新棉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母亲盖的那床棉被的被角里,每年都要缝进姥姥家当年产的新花生。母亲重复着之前的流程:洗被面、被里,絮棉絮,做被子,最终那些精心挑选的花生,被母亲细心缝进了被角处。小时候的我,完全搞不懂母亲的怪异举动,母亲也并不解释,喃喃地跟我说:“你还小,等你长大了,离开妈去远方自然就懂了。”

经年累月的田间劳作,提前透支了母亲的健康。我上高中的那年秋天,母亲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梗,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手上打着点滴的母亲,明显有些神志不清。夜里,盖着医院统一提供的被子,母亲哭闹着不得安睡。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收效甚微。迷蒙中,母亲忽然喊出家乡的名字,随后又接连喊了几声“妈”,听到母亲那一声含糊不清的呼唤,我们瞬间热泪盈眶。母亲的呼喊,让姐姐开了茅塞,姐姐火速赶回家,取回了母亲盖的那床棉被。棉被盖在母亲身上的那一刻,缝进被角里的花生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听到熟悉的声音,母亲渐渐睡熟了。

那一回,我才知道,离开故乡北京的三十年,母亲一直是靠缝进被角里的花生发出的轻响触动入眠的,那微弱的碰撞声,如同远方姥姥暖心的叮咛,让母亲读懂了牵挂,也增添了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更慰藉了思乡的情绪。那缕淡淡的乡愁,融化进温暖的棉被,也浸润到母亲的生命中……

母亲走的那一天,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我们将棉被里的花生取出来,放到母亲的棺木里,哭着对她说:“妈,这回您可以回家了……”

本版配图 张宇尘

物,并不急于抢食,而是先在空中和树上飞过来、飞过去,认定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才会有一只麻雀落下来。这只麻雀站在小米旁边,左顾右盼,不急不缓,也许是在给同伴传递什么信号。等一会儿,在树上、灌木丛中的一些同伴纷纷落下来,围成一个圆圈,贪念地啄食地上的米。我从楼下望去,中间是金色的小米,周围是那些啄食的鸟儿,像一朵葵花。有的时候也来一些大鸟,像鸽子、灰喜鹊什么的。一开始它们来的时候,麻雀便被赶走了,后来时间久了,麻雀似乎也再没有了顾忌,大鸟飞来来的时候,它们就一起啄食。

春天,冬天的时候放一把米,鸟儿很快就吃完了,夏天和秋天放一把米,有的时候第二天还放在那里。那些季节,鸟儿不愁吃的,有许多

喂鸟记

郁葱



虫子和果实可以采食,所以我就尽量把吃不完的陈米,封到一个密闭的罐子里,留到冬天,等到鸟儿饥寒交迫的时候再抓给它们。有时,几只猫也来覬覦那些本来属于鸟们的食物,它们用舌头舔舐这些小米和大米,这时,鸟儿就站在旁边的树上,心情郁闷地看着这几只猫,几分不快,几分无奈。猫们不紧不慢,常常把一堆小米吃得差不多了,才从容离开,鸟儿也只好寻找残存在草丛中剩剩的米粒了。我家住在六楼,有一天,我坐在阳台上喝茶,看着邻居带着他的宠物狗去那里散步,那条狗竟然也津津有味地吃起了小米,我原来以为猫狗这些动物,对生米是不屑一顾的,现在看来,许多固有的观念都要变了,可能变得连自己都会觉得陌生。

每天早晨把米放在那里之后,有闲了,我就在阳台上看看那些鸟儿。鸟是一种非常机敏和聪明的动物,我爱吃水果,去买水果的时候,卖水果的老板总会说:“挑那些有鸟啮过的痕迹的果子,鸟儿们哪个果子好吃,它们啮过的水果最甜。”中午了,看早晨放到楼下的那些米,还有不少在那里。到了下午,鸟儿们便会聚集在那里啄食。不过,它们没有一顿饭能吃得安稳,一有旁边单元门开关或是汽车经过小区路面减速带的声音,它们都要飞到树上,观察好久才会再陆续飞下来。想起来也不怪它们,这些鸟儿都有天然的警惕性,他们觉得周围的声音和气味不可信,其他的动物不可信,人更不可信。

有时候,我在家看着窗外,脑子里总有个念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类,那该会是怎样?觉得无论如何应该比现在更好!那个时候树更像树,草更像草,冬夏分明,天高云淡,野山野河,大明大暗。也会有弱肉强食,也会有优胜劣汰,但那是自然法则,宇宙定数。那时候流水欢欢,莲荷盈盈,天凉有雪,暑热有风,植物自然生长,没有人为的剪裁,鸟儿放肆地鸣叫,不用压抑着出声。那时候电光石火,雨雪冰霜,天地是所有生物的天地,乾坤是任何生命的乾坤。唯一缺憾的是没有人记录那一切,但我想,一定会有另外一种生命,一种更善良的生命,能够把这一切变成记忆!看到那些鸟,内心便有几许安慰和踏实。细想起来,自己的期待挺简单、挺单纯,就像一只鸟,有几粒米,能看得清远处就够了;就像一只兔子,有一根带着嫩绿的胡萝卜就够了;就像一只虫子,能有一些新鲜的草叶,不受到什么伤害,苟

且地生活,苟且地满足,仅此而已。

这时候,想起了我曾经写过的一首关于鸟的诗:“看到鸟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们不一定总是飞翔。/那些鸟,有时成群结队,/也形单影只,/振翅轻捷,身体恒温,/起得早,不熬夜,也不失眠,/早晨有好空气,/树比平时绿,/虫子成群结队,/那时才是鸟儿的好世界。”是啊,鸟儿们也嘈杂,也安静,有时在头顶飞来飞去,你也听不到它们的发声。它们知道哪里冷,哪里暖,感受暑热,预知阴晴,它们定居的地方,一定是最安然的地方。它们单纯,树上的鸟总在说话,说话是习惯和自我满足,不是为了让鸟儿听到。它们自知渺小,懂得畏缩,总是躲避,振翅是为了展开心境,摇头是为了抖落风尘。有多少叶子,就有多少鸟,它们有着近乎相同的生存。于是,我接着写道:“鸟儿们不找路,/天都是它们的路,/天多大啊。/以东以西,也高也低,/高飞广阔,低落踏实。/鸟飞过,总不留痕迹。//在树下,留着它们,不经意落下的一枚轻羽。”这首写于2014年的诗题目叫《鸟儿记》。朋友读了以后问:“这是在写鸟吗?”我说:“你别觉得我是在写自己,许多时候,我的境界不及鸟。”

孩子们放假以后,小区里就显得更有生机。楼下的小树林里那群麻雀在叽叽喳喳,但这几天听不见它们的叫声了,只有孩子们在院子里听和小树林中奔跑玩耍的身影。我散步的时候,走到了楼后面的一片偏僻的小竹林,发现那些麻雀都聚在了这里,它们依然尽情叫着,只是比平时多了一些小心翼翼,行人一走近,它们便马上鸦雀无声,它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喧闹,什么时候应该躲避。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存在,鸟儿们也是。

我也一直惊异鸟儿们奇异的啄食能力,那么小的米,它们能在一二十分钟内啄食干净。最近,还是每天一把米,但鸟来得少了,也许是春天了,田野里有虫子了,也许是鸟儿经常吃米,感觉乏味了。朋友后来跟我说:“鸟吃米,鸟吃虫,优胜劣汰,这是定数,总喂它,鸟也就长胖了,就懒了。”我想,如果从自然规律上来说,朋友说得对,但是如果从情感上讲,我又觉得现在的做法也没什么大错。我不知道在理智和情感之间怎么选。人,真的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后来家里的虫米让鸟儿吃光了,几天没有喂它们,但每到早晨,还是惦记着那些鸟儿,习惯了在这个时间喂食,不喂就总觉得亏欠了它们。给父母打电话,跟他们说如果有长了虫的米,一定不要扔,给我留着喂鸟。父母家的剩米不多,便打电话问朋友们,好像喂鸟,成了一种无可推卸的责任。我总说人是生活在习惯里,现在如果每天早晨不去给那些鸟儿一把米,心里感到空落落的。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自然主义者,这两者的结合会让人纯粹,更多地悲天悯人,也会让人茫然,会对诸多世相产生怀疑。我信奉“大自然不会毫无目的地去创造一切,它总是把每一种生物的基本结构都尽可能完美,由此看来,如果有一种无可击穿的造物方式,那就是大自然的造物方式”。这段话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的步态》。有一段话我总在说大自然,是由于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它真实的面容了。同时,作为一个诗人,我也许还总在追求爱容:对人类,对鱼对鸟,对孩子,对树木花草,对自然中一切的泛爱,爱弱小,爱卑微,爱世界上所有微不足道的生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成为了它们,或者其实你就是它们。我觉得博爱爱能够使人更理智、更理性。想任何时候,都要让人的善尽情释放,而不是反之,让恶无限度地挥发。事实证明,让恶膨胀的最后结果,是毁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仅存的那点儿美好。当然也知道,这未必是一个好的处世方式,但是,有比这更好的吗?

昨天早晨刚睡醒,就听见楼下鸟儿们在叽叽喳喳,我提着袋子的塑料袋下楼的时候,它们在树上扑棱扑棱飞着,叫着,那时,它们对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提防和怯意。

去见婆婆。在见面的一刹那,她不敢正眼看婆婆,生怕与婆婆的目光相遇,但就只瞄了一眼便发现,婆婆真的老了,满脸皱纹,满头白发,身形佝偻。母亲低低地叫了一声:“妈!”喉头哽咽,泪水立时充满了眼眶。婆婆应了一声,便两眼望向母亲,然而母亲眼脸低垂,眼神躲闪着老人质询的目光。老人似乎也看懂了母亲的心思,自言自语地咕咕:“守本干啥看去了?咋还不让回家见面呢?”王守本是父亲在家时的名字,参加工作后改名叫王持久。婆婆和母亲两个人像在演戏,彼此的心照不宣,包含着说不出的试探与揣测,苦涩与悲伤。母亲积蓄了多少年的委屈和悲伤,都在竭力地压抑着,不敢露出一丝。家人出出进进,积极配合着演戏,尽量转移话题,减轻压抑的气氛,待一阵沉默过后,母亲小声地说:“我……给您梳梳头吧!”

奶奶就坐在那儿,母亲站在老人背后,从心里感受到了婆婆的孤独,但还不能表现出来。母亲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就这样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这些痛苦和委屈又向谁去诉说?时间在静默中流淌,母亲强忍悲恸,梳子在婆婆头上一次次掠过,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滴滴滚落在婆婆的头上、肩上。母亲在猜想,老人是不是早就知情了,就是不敢道破这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次过后,婆媳俩再也没有见面,直到老人八十三岁辞世。即使在老人弥留之际,家人也没敢告诉老人真相:您孝顺的大儿子早就先您过世了,家人们为了不让您承受失去爱子的悲伤,而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现在看来,这善意的谎言,就是不让老人承受痛苦为代价,设身处地为老人着想的一种行为方式。殊不知,知情一方所承受的痛苦和思念,更是无法言说与释放,只能在岁月里徒增更多的苦楚,无处消解。

善意的谎言

王雅鸣

脸色凝重地叫住我说:“我上天津,你在家要听话,照顾好你奶奶!”

我不知道老叔为啥要回天津,便没吭声。若干年后才明白过来,老叔当年是专程去料理我父亲后事的,也是去与他一同同胞的哥哥做最后的诀别。而这最后一面,也留给了诸多的憾事。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都会疼一阵,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亲生父亲突然去世,儿子却不知晓,也没机会去看上最后一眼!后来母亲一提起这事,还感到深深的内疚。

可这能怪母亲吗?父亲的猝然离世,不仅瞒着我,还瞒着我奶奶。老人直到仙逝,都不知道自己最孝敬的儿子,已于二十年前就去世了。人间悲剧,难以言说。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母亲始终选择坚韧。那年,我老叔和两个姑姑反复商量,最后决定暂时瞒下父亲去世的消息,生怕风烛残年的奶奶知道,承受不住晚年丧子的打击,谎称我父亲去了国外工作,音信不通。母亲还要按时给奶奶寄钱,保证老人能够按月收到,不露出任何破绽。

然而,最痛苦的莫过于我母亲了。虽说与婆婆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但母亲仍要按月给婆婆写信、寄钱,那种痛苦可想而知。1976年,借出差去北京的机会,母亲鼓起极大的勇气,决定去探望十年未见的婆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两个姑姑也都默契配合,提前让我老叔把奶奶送到了通州我的老姑家。于是,整个家族的人都在期待着这场不同寻常的见面。

那是一个怎样备受煎熬的场景啊!在见面之前,母亲静静地待在另一间屋子里,先是哭了一个够,然后拭去泪痕,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中国年

钦建军

中国的年, 长长的年。 长天、长地、长日月, 长山、长水、长云烟。 身在天涯海角, 心在故乡庭院。

中国的年, 美美的年。 美食、美衣、美风俗, 美街、美灯、美龙船。 人在诗情画意里, 喜在万紫千红间。

中国的年, 新新的年。 新门、新联、新气象, 新风、新俗、新耕田。 爆竹声中除旧岁, 风雪映灯兆丰年。

中国的年, 圆圆的年。 圆老、圆少、圆亲情, 圆家、圆国、圆挂牵。 三杯温馨祝福酒, 一席热烈庆功宴。

中国的年, 盼盼的年。 盼福、盼寿、盼岁好, 盼福、盼运、盼平安。 春夏秋冬斑斓色, 五湖四海锦绣天。